

# 消解收入极化与促进共同富裕

韩文龙,张瑞生,刘璐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为了研究如何制度性消解收入极化的问题,进而促进共同富裕,构建了收入极化“形成-扩大-固化”和中国“消解收入极化”的理论机制,测度了中国居民收入极化水平的变动趋势,并对收入极化及其消解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2012—2020年中国居民收入极化水平呈“降-升-降”的变动趋势;家庭禀赋、社会环境是收入极化形成的主要因素;家庭优势积累、地区发展差异导致的马太效应使收入极化出现动态扩大的趋势;收入两端的居民流动性差异则成为收入极化固化的潜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具有消解收入极化的独特制度优势,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均对居民市场收入的极化水平起到了显著调节作用,脱贫攻坚战则提高了贫困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畅通了向上流动通道;中国应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健全收入调节机制等消解收入极化问题,进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关键词:**收入极化;共同富裕;收入流动性;分配制度;脱贫攻坚;城乡区域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4)04-0001-19

## Alleviating income polarization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HAN Wenlong, ZHANG Ruisheng, LIU Lu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Sichuan, China)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a key feature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o explore how to institutionally alleviate income polarization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of the “formation-expansion-solidification” of income polarization and China’s approach to “alleviating income polarization”. It measures the changing trend of income polarization levels among Chinese residents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of income polarization and its allevi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from 2012 to 2020, income polarization among Chinese residents exhibited a “downward-upward-downward” trend. Family endow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were identified as the main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income polarization. The Matthew effect, driven by the accumulation of family advantag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disparities, led to the dynamic expansion of income polarization. Differences in residents’ mobility at both ends of the income spectrum became a potential mechanism for the solidification of income polarization.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China has uniqu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 alleviating income polarization. Both redistribution and the third distribution have played significant regulatory roles in addressing residents’ market income polarization. The tough battle against poverty has increased the income growth rate of residents in poverty and improved upward mobility.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China should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alleviate income polarization by optimiz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narrowing the regional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improving the income adjustment mechanism.

**Key words:** income polar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income mobility; distribution system; tough battle against poverty; urban-rural regional development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正式将共同富裕从一种价值目标

上升到国家发展阶段目标并付诸实践,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富裕与共享<sup>[1]</sup>。从富裕

角度而言,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居民平均收入增长了 22.8 倍,总体层面的富起来已经逐步实现。从共享角度而言,中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共享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性作用愈发凸显。在衡量指标方面,反映富裕程度的指标相对简单明确,而反映共享程度的指标尚未形成统一意见。目前学术界主要运用收入不平等指标,如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泰尔指数等来反映共享程度,但这类指标倾向于关注群体个体间差异,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收入的整体结构。

从共同富裕的内涵来看,收入极化比收入不平等指标更能体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收入极化是一个与收入不平等紧密相关又有差异的概念。从数量指标上看,收入极化与收入不平等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收入不平等是群组内差距的增函数,而收入极化是群组内差距的减函数;从内容意义上看,收入不平等只考虑了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收入极化还考虑了群体之间的对抗程度,即整个收入分布是否形成两个或多个组内同质而组间异质的群体。收入极化更加注重整体的收入分布或收入结构,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若 a 组收入分布是  $a = \{1, 2, 3, 4, 5, 6, 7, 8, 9, 10\}$ , b 组收入分布是  $b = \{3, 3, 3, 3, 3, 8, 8, 8, 8, 8\}$ , a 组和 b 组与洛伦兹排序相一致的收入不平等衡量指数都相同,但 b 组收入群聚的极化指数却明显大于 a 组。

收入极化研究关注的重点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存在较高适配性,具体表现有:

第一,共同富裕与收入极化都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

一个基本目标,而收入极化关注的阶级对立及其社会冲突也直接受到马克思观点影响。收入极化研究开拓者从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思想中提取了群体间动态冲突的内容观念,并建立了与收入不平等存在差异的收入极化指标。

第二,收入极化体现了共同富裕中防止两极分化这一重要内涵。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就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时,进一步明确了防止两极分化的重要性。而收入极化着重关注的正是收入分布情况,可以对收入两极分化进行有效监测。

第三,收入极化反映了共同富裕的非平均主义特征。追求消除个体之间差异的平均主义不是共同富裕,只衡量个体间差距的收入不平等指标也容易陷入平均主义的误区。收入极化正是关注了总体的收入结构,关注到了差异性组别之间的规模和动态变化,更贴合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第四,共同富裕和收入极化都关注了社会稳定性。从收入极化研究起源来看,防止收入极化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收入极化的研究源于美国滞胀危机,新自由主义帮助美国走出了滞胀,但代价却是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中产阶级以每年 1% 的速度急速减少,阶层对立和冲突日益尖锐<sup>[2]</sup>。收入极化理论将个体所处的群体认同感纳入研究,对群体间差距及其导致的阶层对立、社会冲突等问题具有较好的针

对性<sup>[3-4]</sup>。

因此,收入极化与共同富裕的内涵存在较好的适配性,用收入极化指标去衡量、分析和探索共同富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 一、文献综述

为解决西方国家“中产阶级消失”这一困境,西方学者最早对居民收入极化的内涵和测度进行了研究<sup>[5-6]</sup>。随着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居民收入极化的相关实证研究也逐渐兴起,诸多学者测算和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收入极化情况。WANG et al. 利用欧盟微观数据,分析了欧盟国家的两极分化趋势<sup>[7]</sup>。ANDERSON et al. 以及 CLEMENTI et al. 则分别衡量了加拿大和尼日利亚多群体间的居民两极分化水平<sup>[8-9]</sup>。中国居民收入极化的研究晚于国外,洪兴建等基于相对剥夺理论提出了测度多维极化的新指标,并从多个维度分析了城乡居民多维极化的因素<sup>[10]</sup>。罗楚亮使用 CHIP 和 CFPS 数据讨论了收入和财产的极化特征,发现城乡组间贡献是最主要的极化来源<sup>[11]</sup>。从现有文献的测度结果来看,过去几十年世界各国的居民收入极化水平总体上呈现一定的扩大趋势。

除基本趋势测度外,从实证角度分析收入极化的因素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WANG et al. 通过分解发现市场加剧了欧洲地区居民收入极化水平,而税收缓解了居民收入极化<sup>[12]</sup>。汪晨等使用 Shapley 值分解法发现,工资性收入是居民收入分化的

最主要原因,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则起到减缓分化的作用<sup>[13]</sup>。然而目前对收入极化的研究大都基于指数的简单分解,这只能从宏观层面对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情况进行描述,难以准确发现居民收入极化的内在机制,对于制度和政策体系的完善借鉴有限<sup>[14]</sup>。

综上所述,收入极化理论与共同富裕存在较高适配性,收入极化指标比收入不平等指标能够更好刻画共同富裕进程。目前,学术界对收入极化的重视日益提高,研究重点逐渐从极化趋势测算向极化因素分析转变,但鲜有研究从收入极化角度去衡量、分析和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作为对现有文献的补充,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在研究深度上,将收入极化与共同富裕联系起来研究,构建了居民收入极化“形成-扩大-固化”的微观理论机制和中国“消解收入极化”推动共同富裕的宏观理论机制,并对两种理论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二是在时间跨度上,本文测算了2012—2020年中国居民的收入极化水平,这对以往的文献进行了很好的验证与补充。结合现有研究我们发现,新时代以来中国居民收入极化水平得到了一定控制,但面对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国内结构性问题凸显、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等诸多挑战,消解极化、实现共同富裕仍需久久为功。三是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使用基于回归的 Shapley 值分解方法,结合计量回归方法对中国居民收入极化的趋势、机制和消解进行了全面的描绘。传统的分解方法存在两个缺陷,其一是只能对特定的极化指数(如 DER 指数)进

行分解,其二是无法分解极化的具体来源,基于回归的 Shapley 值分解方法可以很好地克服上述缺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收入极化的研究空间。

## 二、理论机制

### (一) 收入极化的“形成 - 扩大 - 固化”机制

居民收入极化的形成起点是微观家庭的收入差距。一般家庭的收入主要依赖于要素报酬,即家庭拥有的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市场流通以获取要素收入,形成了家庭收入中占据主体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居民收入的不正当分布形成了居民收入极化,从这一逻辑起点而言,居民收入极化的形成主要依赖于两点:一是居民家庭的要素资源禀赋分布是否合理,即家庭禀赋差异;二是这些要素资源禀赋的回报率是否合理,即社会环境差异。前者不合理就会在横向上造成不同禀赋的家庭之间形成收入差距,从而导致家庭存量的各类资本越多,流量的收入越多;后者不合理就会使市场机制无法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妨碍了要素投入者获取应得的回报,例如劳动力市场的错配就会破坏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不利于社会公平。此外,家庭固有的人口特征也可能对居民收入产生一定作用,从而影响居民收入极化。

居民收入极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其突出表现就是存在着明显的马太效应,从而使一般的收入差距演变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如果

政府不加干预,很容易出现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极化扩大现象。马太效应的本质就是优势积累,从物质资本来看,物质资本充足的人更容易基于自身所拥有的禀赋拓展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源。例如在金融资本领域,金融市场并不愿意为缺乏资本的群体提供服务,而往往是富有资本的群体更容易获得借贷以实现资本增值。从人力资本来看,人力资本匮乏的家庭,其成员往往技能落后,这进一步引致高质量就业机会匮乏,导致部分群体被锁死在低薪行业,并限制其职场晋升的机会,从而持续扩大贫富阶层的收入差距。富有人力资本的家庭往往能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并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人力资本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居民收入在长期内的两极分化。而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缺乏抵押品,收入较低的群体很难进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这进一步固化了人力资本差异导致的两极分化<sup>[15]</sup>。从社会资本来看,富有社会资本的群体往往能利用关系网络接触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和信息渠道,其社会资本投资的质量更高,能撬动的社会资源更加优质和丰富。正是由于社会资本在占有量和回报率存在差异,因而也会造成收入极化的扩大<sup>[16]</sup>。此外,地区之间的收入增长差距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微观家庭收入差距的扩大。

当收入极化扩大到一定程度时,整个社会收入分布的两极出现,并致使收入极化出现固化,进而加剧社会矛盾。收入极化固化为居民随时间在低收入阶梯中更难向上或向下移动,从而在低收入群体形成贫困陷阱,收入较低的家庭难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而高收入群体则掌握了阶层上升的渠道,最终形成严重的阶层固化。当居民处于流动性较差的社会中时,低收入者难以获得与高收入者相同的机会,其在收入阶梯上的攀升受到阻碍。从代际传递的角度来看,个人的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条件,高收入家庭的子女享受着更高的教育资源和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这种家庭资源的跨代转移,往往导致一些家庭先天比其他家庭更具优势,从而导致代际间的收入极化固化问题。

## (二)中国“消解收入极化”的优势和机制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多数国家的收入差距在经过政府调节前都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当政府以合理的分配制度体系加以规范,且配套有力的针对性政策时,收入差距就能实现有效的控制,反之则会出现巨大的收入鸿沟与阶层分裂。可以说,分配制度体系在控制收入两极分化、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上具有基础性作用,没有公平的分配制度就没有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而针对不同阶层的配套政策能在分配制度的基础上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从而针对性治理收入极化。由此可见,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分异,主要是各国政府制度和政策的有效性差异所导致的。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天然具有消解收入极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中国消解居民收入两极分化,需要把握两个着力点。

第一,完善分配制度,构建合理的制度体系。应发挥市场、政府和社会各主体在不同阶段的主导性作用,构建起初次分配、再分

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在初次分配中,应当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断提高市场化水平以使得要素贡献能被准确衡量,实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同时政府也要发挥其维护市场经济公平正义的职责,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市场治理水平。在再分配中,政府应采取多种手段对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行合理调节,缩小初次分配导致的收入极化趋势,其原则应坚持公平优先,其关键应把握如何分好蛋糕<sup>[17]</sup>。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第三次分配是控制居民收入极化水平的重要补充,其鼓励高收入群体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以自觉自愿为原则实现资源在社会两端的传递,从而有效缓解居民收入极化。

第二,推进收入分配针对性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切实促进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的任务,急不得也等不得,在完善分配制度体系的同时,也要制订针对性的政策促进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迈进。治理居民收入极化的政策应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为导向,通过提低、扩中、调高多种方式形成收入极化水平合理可控的居民分配格局。从这一政策导向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农村打响的脱贫攻坚战将对居民收入极化水平起到重要的调控作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顺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2012—2018年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9899万降

低至1 660 万,大量的低收入群体摆脱贫困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有效改善了收入差距,而且有力缩小了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全方位缓解了中国居民的收入极化水平。

三、中国居民收入极化的变动趋势

(一)居民收入极化的测度方法和数据来源

1. 估计方法

20 世纪 90 年代,学术界开始建立起有别于传统收入不平等的收入极化测度指标,从构建思路和适用情景来看,主要有  $W$  型指数和  $ER$  型指数两类。由于两类指数均不存在一个绝对标准以判断极化水平,因此直接使用这两类指数对某一时点的居民收入极化程度进行测度是无意义的,而是需要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观察相应指数的变动趋势。又由于各指标的侧重点不同,因此判断一段时期内居民收入极化的变动时,还需要使用多指标综合多种方法进行判断以得到一致的指标估计。本文主要使用以下两种类型的指标对居民收入极化的水平进行测算。

(1)  $W$  型指数

基尼系数等传统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来源于洛伦兹曲线,受此启发 FOSTER et al. 从洛伦兹曲线出发构建了极化曲线,并在 1994 年正式提出了极化效应的测度方法<sup>[18]</sup>。公式如下

$$W = \frac{2(2T - G)}{m/\mu} \tag{1}$$

式中: $m$  和  $\mu$  为全部人口收入的中位数和平均数, $T$  为 50% 低收入人群的人口占比与收入占比的差值, $G$  为基尼系数。进一步而言,通过分解基尼系数  $G$ ,可得

$$W = \frac{2\mu(G_B - G_W)}{m} \tag{2}$$

式中: $G_W$  和  $G_B$  分别表示基尼系数分解所得的组内不平等和组间不平等。

式(2)体现了 WOLFSON 测度极化效应的基本思路:同等收入群体内部存在聚合效应,而不同收入的群体间存在着拮抗效应,前者的衰减或后者的增强都会使得收入的分化更加严重。此外式(2)还表明,组间不平等的扩大会使基尼系数和极化效应同时增加,组内不平等的扩大会使二者向相反的方向变化,这体现了收入极化与收入不平等的本质区别。

(2)  $ER$  型指数

ESTEBAN et al. 提出了群体的认同感和疏远感,以此构建了另一种思路的收入极化指数<sup>[6]</sup>。他们认为,个体对与自己收入相近的群体会产生认同感,且这种认同感会随着群体人数的增加而得到强化,因而可定义一个随组内规模递增的认同函数。同时,个体对与自身收入存在距离的群体会产生疏离感,且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疏远感会增强,依此可构建疏远函数。每一个个体都会受到程度不一的认同和疏远,从而产生有效对抗,而社会总的极化效应就是所有个体有效对抗的总和。根据这一思路提出的极化效应指数为

$$ER = K \sum_{i=1}^n \sum_{j=1}^n p_i^{1+\alpha} p_j |x_i - x_j| \tag{3}$$

式中: $K$  为正数,主要起到标准化指数的作

用; $n$  为组内个体数; $\alpha \in [1, 1.6]$  是衡量极化敏感度的参数; $p_i$  和  $p_j$  分别表示第  $i$  组和第  $j$  组的人口占比,即为认同函数; $x_i$  和  $x_j$  分别表示第  $i$  组和第  $j$  组的平均收入,即为疏远函数。 $ER$  指数虽然没有直接引入基尼系数,但当  $\alpha$  为 0 时  $ER$  极化指数与基尼系数是等价的。

式(3)中不论是各参数、认同函数还是疏远函数都未考虑组内成员认同感的差异,这表明  $ER$  指数的构建前提是假设组内认同感一致。为修正这一假设与现实的差异,ES-TEBAN et al. 给出了改进后的极化指数,即  $EGR$  指数<sup>[19]</sup>。公式如下

$$EGR = K \sum_{i=1}^n \sum_{j=1}^n p_i^{1+\alpha} p_j |x_i - x_j| - \beta(G - G(x)) \quad (4)$$

式中: $\beta$  为衡量组内聚合度的参数, $G$  为实际基尼系数, $G(x)$  为假设组内成员收入为该组平均收入时的基尼系数。 $EGR$  系数引入了组内不平等,并采取了与  $W$  型指数类似的处理方式。因而可以说, $W$  型指数是  $EGR$  型指数的一种特殊情况。尽管  $EGR$  型指数消除了组内认同感一致这一隐含假设,但对组内不平等的处理仍不完善,当组内收入存在重叠时, $EGR$  型指数则会产生偏误。为解决这一问题,VEGA et al. 提出测度收入极化的  $LU$  指数<sup>[20]</sup>。公式如下

$$LU = K \sum_{i=1}^n \sum_{j=1}^n p_i^{1+\alpha} p_j (1 - G_i)^\beta |x_i - x_j| \quad (5)$$

式中: $G_i$  为第  $i$  组的基尼系数。对比式(4)和式(5)可以发现, $LU$  指数并不是以相减的方式引入组内不平等,而是以相乘的形式将其内化到认同函数上。

通过对  $W$  型指数和  $ER$  型指数的梳理可以发现,两种指数所使用的研究情形各有侧重: $W$  型指数是专门测度两极极化效应的指数,而且分组是以某收入点为界限的; $ER$  型指数可以用来测度多极极化效应,其指标形式更为多样。多种测度方法的运用保障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有助于本文更准确判断中国居民收入极化的基本状况。

## 2.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该数据样本覆盖全国 25 个省份,详尽调查了样本家户的全部家庭成员,具有全国代表性,为本文研究居民收入极化情况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自 2010 年起,CFPS 对追踪对象每两年访问一次,能够全面体现近 10 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和居民生活的变迁。综合考虑时代背景与数据可得性,本文最终选择 2012—2020 年共 5 次追踪调查数据进行收入极化效应的测算与分析,以保障研究样本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在数据处理方面,本文对一些重要变量缺失的样本进行了剔除和处理,对家庭收入、家庭资产相关变量以 2012 年为基期进行了 CPI 平减处理,最终将 5 期调查数据合并为非平衡面板数据以供后续研究。本文使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 (二) 2012—2020 年中国居民收入极化水平的变动

表 2 展示了  $W$  指数、 $ER$  指数、 $EGR$  指数、 $LU$  指数 4 种居民收入极化指标的测度结果,此外本文还计算了中等群体收入占比。各指数测算的分组依据为: $W$  指数根据定义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变量     | 含义        | 样本量    | 均值      | 方差      |
|--------|-----------|--------|---------|---------|
| ln inc |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 58 388 | 8. 732  | 1. 990  |
| ln as  | 家庭人均净资产对数 | 58 388 | 10. 311 | 3. 694  |
| edu    | 受教育年限     | 58 388 | 7. 591  | 4. 186  |
| ln soc | 人情礼支出对数   | 58 388 | 4. 778  | 2. 998  |
| urban  | 是否为城镇     | 58 388 | 0. 496  | 0. 500  |
| east   | 是否为东部     | 58 388 | 0. 332  | 0. 471  |
| gov    | 地方政府评价    | 58 388 | 3. 452  | 0. 767  |
| age    | 家庭平均年龄    | 58 388 | 47. 568 | 14. 083 |
| gender | 家庭男性比例    | 58 388 | 0. 495  | 0. 300  |
| fsize  | 家庭规模      | 58 388 | 3. 752  | 1. 862  |

以收入中位数为界限将全体居民分为两组；*ER*、*EGR*、*LU* 指数参考洪兴建等的做法，以收入算术平均数将全体居民分为两组<sup>[21]</sup>。在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的测度上，目前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主要有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两类方法。其中相对标准考虑了收入差距，能衡量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变动趋势，且可以排除物价变动干扰，因而可以从收入水平和人口比重两个层面衡量中等收入群体<sup>[22]</sup>。本文采用相对标准方法，并借鉴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和中间偏上收入组视为中等收入群体。

表 2 2012—2020 年中国居民收入极化的测度结果

| 收入极化指标        | 2012    | 2014    | 2016    | 2018    | 2020    |
|---------------|---------|---------|---------|---------|---------|
| <i>W</i> 指数   | 0. 540  | 0. 508  | 0. 556  | 0. 572  | 0. 540  |
| <i>ER</i> 指数  | 0. 185  | 0. 179  | 0. 184  | 0. 189  | 0. 185  |
| <i>EGR</i> 指数 | 0. 115  | 0. 112  | 0. 117  | 0. 122  | 0. 117  |
| <i>LU</i> 指数  | 0. 235  | 0. 228  | 0. 235  | 0. 238  | 0. 233  |
| 中等群体收入占比/%    | 45. 491 | 45. 714 | 45. 316 | 44. 714 | 46. 747 |

由于各指标参数存在差异，因而两种指标之间难以直接进行横向对比，为使测算结果更加直观，本文以 2012 年为基期计算了各指标的相对数，得到了 2012—2020 年中国居民收入极化的趋势图，具体见图 1。结合图

表可以发现：总体而言，2012—2020 年中国居民收入极化水平呈“降－升－降”的变动趋势，与之相对应的是 20%—80% 收入水平的居民收入占比呈反方向变动，这从侧面反映了研究居民收入极化问题对构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极化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而在 2016 年极化水平则有所回弹，该结论基本与现有学者的测算结果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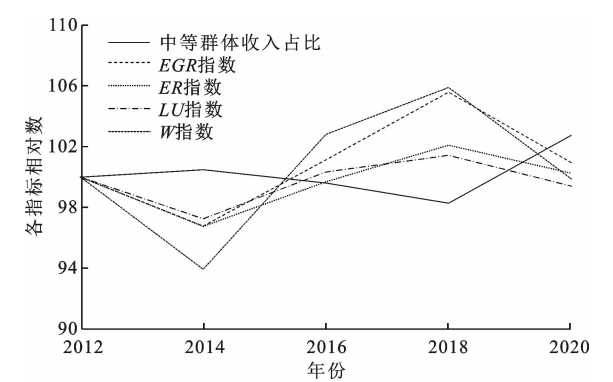


图 1 2012—2020 年中国居民收入极化的变动趋势

从中国的经济实践来看，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着力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对居民收入极化起到了良好的缓解效果。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测算结果来看，2016 年与 2018 年居民收入极化水平回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历史性转变。在精准把握中国主要矛盾的前提下，党和政府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从测算结果来看,2020 年收入极化水平的大幅降低以及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占比的显著提高证明了中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决心和成效。

四、收入极化的“形成 - 扩大 - 固化”机制分析

(一) 收入极化形成的主要机制：  
基于收入决定方程的 Shapley 值分解

本文基于居民收入决定方程的 Shapley 值分解对居民收入极化形成机制进行研究,在估计收入决定方程的基础上确定收入极化的形成因素,并对其进行分解以确定各因素的贡献值。

1. 居民收入决定方程的估计

考虑家庭禀赋、社会环境和人口特征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构建如下收入决定方程

$$\begin{aligned} \ln inc_{it} = & \beta_0 + \beta_1 \ln as_{it} + \beta_2 edu_{it} + \\ & \beta_3 \ln soc_{it} + \beta_4 urban_{it} + \beta_5 east_{it} + \\ & \beta_6 gov_{it} + \beta_7 age_{it} + \beta_8 gender_{it} + \\ & \beta_9 fsize_{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6)$$

式中: $i$  和  $t$  分别代表家庭和年份; $\ln inc$  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数; $\ln as$ 、 $edu$  和  $\ln soc$  分别表示家庭人均净资产对数、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家庭人均人情礼支出对数,用以衡量一个家庭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urban$ 、 $east$  和  $gov$  分别表示城乡、区域和地方政府评价; $age$ 、 $gender$  和  $fsize$  分别表示家庭平均年龄、男性比例和家庭规模,用以衡量人口特征; $\varepsilon$  为随机误差项; $\beta_0$  为截距项, $\beta_1 - \beta_9$  均为待估参数。

收入决定方程的估计结果见表 3。其中第(1) — (3)列依次加入了家庭禀赋变量、社会环境变量和人口特征变量,结果表明各变量均显著影响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表 3 中可以发现:

第一,家庭人均净资产、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人情礼支出均可以显著提高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具体而言,家庭人均净资产每提高 1%,将提高其成员约 0.03% 左右的收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 1 年将提高其成员 10% 左右的收入,人情礼支出每提高 1% 将提高其成员 0.07% 左右的收入。

第二,社会环境会显著影响居民的收入

表 3 居民收入决定方程的估计结果

| 变量        | (1)                  | (2)                  | (3)                   |
|-----------|----------------------|----------------------|-----------------------|
|           | $\ln inc$            | $\ln inc$            | $\ln inc$             |
| $\ln as$  | 0.032 ***<br>(0.002) | 0.030 ***<br>(0.002) | 0.029 ***<br>(0.002)  |
| $edu$     | 0.097 ***<br>(0.002) | 0.093 ***<br>(0.002) | 0.099 ***<br>(0.002)  |
| $\ln soc$ | 0.069 ***<br>(0.004) | 0.069 ***<br>(0.004) | 0.070 ***<br>(0.004)  |
| $urban$   |                      | 0.103 ***<br>(0.018) | 0.091 ***<br>(0.018)  |
| $east$    |                      | 0.591 **<br>(0.262)  | 0.567 **<br>(0.258)   |
| $gov$     |                      | 0.064 ***<br>(0.011) | 0.056 ***<br>(0.011)  |
| $age$     |                      |                      | 0.003 ***<br>(0.001)  |
| $gender$  |                      |                      | 0.198 ***<br>(0.028)  |
| $fsize$   |                      |                      | -0.027 ***<br>(0.004) |
| 省级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年份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N$       | 58 388               | 58 388               | 58 388                |
| $R^2$     | 0.131                | 0.132                | 0.135                 |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水平,城乡之间、东部沿海和内陆之间还存在收入差异,生活在城镇地区的居民其收入水平比农村地区平均高 10% 左右,而东部居民的收入水平则比其他地区居民高 50% 以上。地方政府的效率对本地居民的收入也至关重要,其评价每提高一个单位,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将会提高 6% 左右。

第三,家庭人口特征也会影响居民收入,平均年龄和男性占比的提高对居民收入起到正向影响,而家庭规模越大其成员收入则会越低。

2. 基于居民收入决定方程的 Shapley 值分解

下面本文使用半对数模型进行 Shapley 值分解。在半对数模型中,共同的截距项不会对居民收入极化水平产生影响;按年度分解时,时间虚拟变量也不会对居民收入极化差异造成影响;对于反映地方特征的截面虚拟变量,可以看作地域固定差异,可以引入一个影响系数为 1 的变量  $d$  来代表省际间不可观测的固定差异<sup>[23]</sup>。

Shapley 值分解的结果见表 4。横向来看,家庭禀赋对家庭收入差异的贡献率最高,其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在所有因素中排序始终为第一,其贡献率始终在 30% 以上,甚至在 2012 年达到了 61.6%;家庭社会资本的贡献率也始终保持在 10% 以上,由于社会资本的特殊性,高收入阶层拥有的丰富社会资本将能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导致居民收入极化的形成;物质资本对收入分化的贡献率约在 5%—15% 之间,其对居民收入极化的形成影响不容忽视。从现实来看,物质

表 4 基于居民收入决定方程的 Shapley 值分解结果

| 变量       | 2012  |    | 2014  |    | 2016  |    | 2018  |    | 2020  |    |
|----------|-------|----|-------|----|-------|----|-------|----|-------|----|
|          | 贡献度   | 排序 | 贡献度   | 排序 | 贡献度   | 排序 | 贡献度   | 排序 | 贡献度   | 排序 |
| $\ln as$ | 0.075 | 3  | 0.106 | 3  | 0.068 | 4  | 0.118 | 3  | 0.077 | 5  |
| $edu$    | 0.616 | 1  | 0.481 | 1  | 0.431 | 1  | 0.446 | 1  | 0.372 | 1  |
| $soc$    | 0.134 | 2  | 0.193 | 2  | 0.143 | 3  | 0.105 | 4  | 0.130 | 3  |
| $urban$  | 0.036 | 5  | 0.041 | 5  | 0.157 | 2  | 0.166 | 2  | 0.188 | 2  |
| $east$   | 0.002 | 10 | 0.072 | 4  | 0.067 | 5  | 0.052 | 6  | 0.064 | 6  |
| $gov$    | 0.005 | 9  | 0.003 | 10 | 0.011 | 9  | 0.002 | 10 | 0.007 | 9  |
| $age$    | 0.029 | 7  | 0.039 | 7  | 0.036 | 7  | 0.032 | 7  | 0.094 | 4  |
| $gender$ | 0.051 | 4  | 0.004 | 9  | 0.001 | 10 | 0.015 | 8  | 0.022 | 8  |
| $fsize$  | 0.034 | 6  | 0.039 | 6  | 0.065 | 6  | 0.055 | 5  | 0.042 | 7  |
| $d$      | 0.018 | 8  | 0.021 | 8  | 0.022 | 8  | 0.009 | 9  | 0.005 | 10 |

资本可以通过利息、股息或其他资本收益产生大量的额外收益,进而导致了不同收入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收入差距。当家庭无力支持其成员进行人力资本积累时,其成员将难以系统学习到高薪职业所需的工作技能,或者其拥有的技能与工作的需求出现错配,从而导致收入较低。社会资本指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其积累往往具有排他性<sup>[24]</sup>。社会环境和人口特征对收入极化的贡献相对较小,大部分在 10% 以下。

纵向来看可以发现以下几点:一是人力资本导致的居民极化逐渐从高位回落,从 2012 年的 61.63% 降至 2020 年的 37.21%,这表明中国居民教育资源的公平性越来越高,机会公平已经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方面;二是城镇这一环境因素的贡献度在 2014—2016 年之间跃升了 11.6%,这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体现,即部分城乡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

总体而言,家庭禀赋的差异、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人口特征的差别都会在不同程度上

引致居民收入极化的形成,其中家庭禀赋差异是居民收入极化的最主要形成因素,而社会环境尤其是城乡差距对居民收入极化的形成越来越重要,人口特征的分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极化的形成。

(二) 收入极化扩大的动态机制:  
基于宏微观的马太效应分析

居民收入极化不仅是一个静态结果,而且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收入差距在不加干预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马太效应从而滑向两极分化。由家庭禀赋、社会环境、人口特征差异导致的收入差距即使达不到两极分化,但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如果不加以调控,收入极化可能会扩大。

1. 微观层面的马太效应:家庭禀赋的优势积累

居民收入极化从形成到扩大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优势群体不断进行优势积累的过程。在收入分配领域,具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初始优势的群体更容易获得较高收入,从而有机会对各类资本进行投资,不断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力,拓宽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这种再投资的方式,初始的禀赋差异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随着时间推移,高收入群体可以创造和获取更多的财富,而低收入群体则可能陷入贫困陷阱。

为研究居民收入极化扩大过程中的微观机制,本文验证了各类家庭资本的优势积累过程,结果见表5。本文借鉴王修华等以异质性对比验证马太效应的做法,构建了收入阶层 *class* 和3类家庭禀赋的交互项,用于观察家庭所处阶层在其中的作用<sup>[25]</sup>。表5中

表5 家庭禀赋的优势积累过程

| 变量                           | (1)                  | (2)                  | (3)                  |
|------------------------------|----------------------|----------------------|----------------------|
|                              | ln <i>inc</i>        | ln <i>inc</i>        | ln <i>inc</i>        |
| ln <i>as</i> × <i>class</i>  | 0.042 ***<br>(0.002) |                      |                      |
| <i>edu</i> × <i>class</i>    |                      | 0.066 ***<br>(0.002) |                      |
| ln <i>soc</i> × <i>class</i> |                      |                      | 0.049 ***<br>(0.002)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省级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年份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i>N</i>                     | 58 388               | 58 388               | 58 388               |
| <i>R</i> <sup>2</sup>        | 0.363                | 0.381                | 0.363                |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第(1)—(3)列的解释变量分别为家庭人均净资产与收入阶层的交互项、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与收入阶层的交互项、家庭人均人情礼支出与收入阶层的交互项,被解释变量则为家庭人均收入。研究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均为正,这表明收入阶层越高,家庭各类禀赋对家庭成员收入的提高作用越大。如果政府不进行积极的调控,这种优势积累的马太效应将致使居民收入极化不断扩大,中间阶层不断流失,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越来越向两极移动。

2. 宏观层面的马太效应:地区经济的发展差距

从宏观来看,若不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也会引起居民收入出现马太效应,即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农村居民,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其他地区居民,从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乃至形成两极分化。

图2、图3 分别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东、中、西部居民收入增长的对比图。从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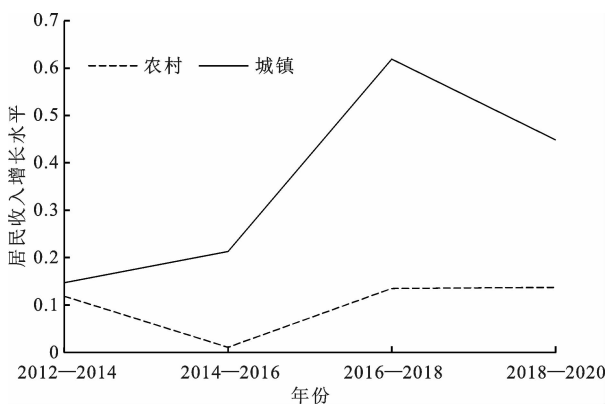


图2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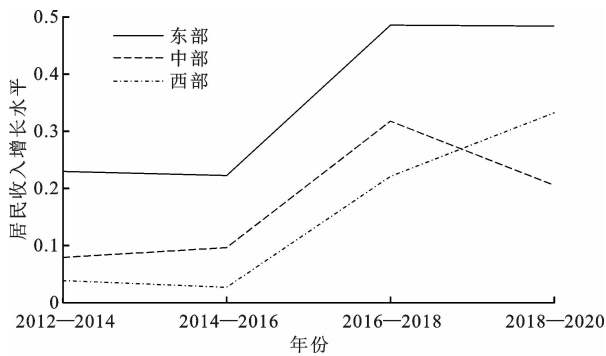


图3 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对比

可以发现,2012—2020 年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均保持正向增长,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收入增长速度差距。2012—2018 年间,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量高于农村居民,且这种差距总体上在逐渐拉大。2012—2014 年,城镇居民增长略高于农村居民,尽管这一趋势在2018—2020 年得到了一定遏制,但中国城乡发展差距带来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差异问题仍不容忽视。从图3 中则可以得到以下两点结论:一是2012 年以来,中国东、中、西部居民的收入整体上保持不断增长的趋势,且收入增长的幅度越来越大。二是从不同地区的增幅度来看,东部地区居民收入的增长要快于中西部,2018 年前中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高于西部。

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城乡居民、各地区居民的收入均保持稳定增长,但在增长的速度上,城镇地区要高于农村,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这些因素成为收入极化“扩大”的主要推动因素。

(三) 收入极化固化的潜在机制:  
基于流动性与向上流动通道考察

当收入极化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如不加以干预,收入极化就可能会出现固化。在两极分化较严重的社会中,低收入群体难以通过勤劳努力或教育培训来迈向高收入的阶层,其在收入低端难以向上攀升,而高收入群体不断进行优势叠加,由此导致整个社会分为两极,经济发展受挫,社会矛盾尖锐。因此,缓解居民收入极化水平,不仅要缩小收入差距,还要防止收入极化固化。

表6 展示了不同收入层级居民的流动性概况。从全样本的流动性水平来看,59.223%的居民在两期内收入层级发生了变动,84.848%的居民在所有观测期内存在收入阶层变动,28.479%的居民实现了收入层级的向上攀升。这表明目前社会流动性相对较为充足,有效防范了社会阶层的固化,有利于破除居民收入极化的潜在因素,从而不断为社会各收入层级注入活水。

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居民收入流动性和收入层级之间的关系,以此探究居民收入极化固化的潜在因素,结果见表7。参考彭澎等的做法,将样本分为4 个组别来考察不同家庭收入组别的流动性概率差异<sup>[26]</sup>。本文引入了代表收入组别的虚拟变量,在第(1)(2)列中将高收入组设为对照组,在第(3)列将

表 6 中国各收入层级居民的收入流动性水平

| 变量   | 含义            | 低收入组均值 | 中等偏下收入组均值 | 中等收入组均值 | 中等偏上收入组均值 | 高收入组均值 | 全样本均值  |
|------|---------------|--------|-----------|---------|-----------|--------|--------|
| $sf$ | 两期内收入层级变动概率/% | 55.050 | 66.548    | 69.385  | 64.040    | 40.734 | 59.223 |
| $lf$ | 长期内收入层级变动概率/% | 84.848 | 93.198    | 93.844  | 90.654    | 61.703 | 84.848 |
| $uf$ | 两期内收入层级上升概率/% | 55.050 | 38.959    | 29.586  | 18.965    |        | 28.479 |

表 7 不同收入层级的收入流动性比较

| 变量       | (1)                  | (2)                  | (3)                  |
|----------|----------------------|----------------------|----------------------|
|          | $sf$                 | $lf$                 | $uf$                 |
| 低收入组     | 0.291 ***<br>(0.038) | 0.641 ***<br>(0.037) | 3.072 ***<br>(0.046) |
| 中间偏下收入组  | 0.776 ***<br>(0.038) | 1.498 ***<br>(0.046) | 2.347 ***<br>(0.044) |
| 中间收入组    | 0.943 ***<br>(0.037) | 1.696 ***<br>(0.047) | 1.771 ***<br>(0.043) |
| 中间偏上收入组  | 0.777 ***<br>(0.035) | 1.440 ***<br>(0.040) |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省级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年份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N$      | 37 877               | 51 895               | 37 874               |
| $ad-R^2$ | 0.043                | 0.147                | 0.158                |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中间偏上收入组设为对照组,通过对比其他各收入组系数大小探究不同收入组的流动性差异。

从表 7 第(1)列各收入组的系数可以发现,中间收入组短期流动性最高,中间偏上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稍次,低收入组短期流动性强于高收入组。第(2)列汇报了各收入阶层的长期流动性水平,其基本结果与第(1)列相似,中间收入群体的长期流动性最高,低收入组长期流动性仍高于高收入组。第(3)列的结果显示,收入层级越低,其向上流动的概率水平越高,这表明中国低收入群体的向上流动通道是畅通的,收入极化固化并未在中国出现。但相较于中间各收入组,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流动性相对较差,因

此,要防止两极分化,必须建立起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五、消解收入极化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优势和政策效应

(一) 分配制度体系的基础性作用

分配制度是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其中,初次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基础环节,是国民按照要素付出获得的要素报酬,受劳动者个体差异等客观因素影响,初次分配必然会存在一定的收入差异。因此,必须以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对初次分配结果进行一定的调节。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一方面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起到了提低的作用,另一方面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进行调节,起到了调高的作用。可见,再分配是中国分配制度体系发挥缩小收入极化基础性作用的关键,对控制中国居民收入极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第三次分配中,社会力量作为三次分配的主体,将对市场主导的初次分配和政府主导的再分配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其实质是高收入群体自愿向低收入群体进行资源的转移,这将有助

于消解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

本文使用反事实分解法,在计算市场收入极化指数的基础上考察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各方式对市场收入极化指数的降低作用,以此衡量中国分配制度对居民收入极化治理的基础性作用。表8测算了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对居民收入极化水平的影响,以探究消解收入极化的着力点。其中,个税、社保缴费、政府补助和养老退休金为再分配方式,社会捐助和私人转移为第三次分配方式。结果表明:(1)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中都降低了市场收入的居民收入极化水平,这表明中国的分配制度体系对初次分配结果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对中国居民收入的极化水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控制效果。(2)从再分配各手段的效应大小来看,对低收入群体直接进行财政干预的转移支付手段(包括政府补助和养老退休金)对居民收入极化的治理效应最大,这一结论与 KRISTJANSSON、蔡萌等的结论保持一致<sup>[27-28]</sup>。其次是社保缴费的分配效应,个人所得税也对居民收入极化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3)第三次分配中,目前

仍主要是私人转移对居民收入极化起到了治理作用,社会捐助降低极化的作用还有待提高。伴随着全社会公益慈善意识的增强,社会捐助对居民收入极化的治理必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脱贫攻坚的政策性效应

从社会性质来讲,相较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具有促进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的制度优越性。从这个意义来讲,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贫困事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特别是以平均每年1 000 多万人口脱贫的速度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为有效改善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消解收入极化、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典范。

2012 年6 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公布全国连片特困地区名单,在全国共划分了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包括680 个县。2014 年印发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针对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瓶颈,要以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为主战场。本文将利用2012 年发布的全国连片特困地区名单,采用双重差

表8 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对居民收入极化的控制作用

| 类别    | 2012  |       | 2014  |       | 2016  |       | 2018  |       | 2020  |       |
|-------|-------|-------|-------|-------|-------|-------|-------|-------|-------|-------|
|       | 极化指数  | 分配效应  | 极化指数  | 分配效应  | 极化指数  | 分配效应  | 极化指数  | 分配效应  | 极化指数  | 分配效应  |
| 市场收入  | 0.673 |       | 0.622 |       | 0.671 |       | 0.666 |       | 0.635 |       |
| 个税    | 0.674 | 0.000 | 0.624 | 0.002 | 0.673 | 0.003 | 0.675 | 0.009 | 0.641 | 0.006 |
| 社保缴费  | 0.689 | 0.015 | 0.633 | 0.011 | 0.689 | 0.018 | 0.689 | 0.023 | 0.674 | 0.039 |
| 政府补助  | 0.644 | 0.029 | 0.595 | 0.027 | 0.650 | 0.021 | 0.636 | 0.030 | 0.614 | 0.021 |
| 养老退休金 | 0.595 | 0.078 | 0.549 | 0.073 | 0.587 | 0.084 | 0.623 | 0.043 | 0.566 | 0.069 |
| 社会捐助  | 0.673 | 0.000 | 0.621 | 0.000 | 0.671 | 0.000 | 0.665 | 0.001 | 0.635 | 0.000 |
| 私人转移  | 0.638 | 0.035 | 0.602 | 0.020 | 0.651 | 0.020 | 0.661 | 0.005 | 0.632 | 0.004 |

注:市场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已缴纳个税和社保,但不包括各类补助和转移支付等;个税是根据个人所有的主要工作和一般工作的税后工资收入,按照当年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得出;社保缴费为五险一金的缴纳总额;政府补助包括低保、退耕还林补助、农业补助(包括粮食直补、农机补助等)、五保户补助、特困户补助、工伤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救济金、赈灾款等;养老退休金为养老金和离退休金总额;社会捐助指现金或实物形式(如食品、衣服等)的社会捐助;私人转移指亲戚赠予的收入和其他人赠予的收入。

表 9 脱贫攻坚对贫困收入居民的政策影响

| 变量             | (1)                  | (2)                  |
|----------------|----------------------|----------------------|
|                | ln inc               | uf                   |
| <i>policy</i>  | 0.109 ***<br>(0.040) | 0.068 ***<br>(0.016)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 年份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 个体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 N              | 31 783               | 31 783               |
| R <sup>2</sup> | 0.037                | 0.010                |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动性,这将有利于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从而对消解收入极化起到较好的政策效果。

六、结论与启示

收入极化是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面临的重大难题,中国要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就必须充分意识到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本文探讨了消解收入极化的共同富裕之路,基于 CFPS 2012—2020 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测算了中国居民收入极化的变动趋势,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证分析上探究了居民收入极化“形成—扩大—固化”机制和中国“消解收入极化”机制。本文的基本结论和政策启示如下:

(一)基本结论

从收入极化趋势测算结果来看,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有效遏制了逐渐扩大的收入两极分化趋势,尤其是随着共同富裕的稳步推进,居民收入极化水平正在逐渐消解。

从居民收入极化形成的主要因素来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家庭禀赋

分法评估新时代脱贫攻坚对居民收入极化的政策性影响。本文的政策变量 *policy* 是 2012 年是否为连片特困地区名单上的区县,如果在名单则为 1,视为脱贫攻坚重点作用的处理组,其他区县则为 0,视为受脱贫攻坚直接影响较弱的对照组;本文的时间变量也为虚拟变量,以脱贫攻坚为界限,2012 年视为政策实施前,2014、2016、2018、2020 年视为政策实施后。在模型设定上,双重差分要满足两点假设,即满足政策外生和平行趋势条件。贫困地区的划分主要是过去一段时间的平均收入,而与其他经济指标相关性不强,因此在控制初始年份的平均收入后,可以认为这些地区被选入名单是外生的<sup>[29]</sup>。此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区县与其他区县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存在诸多不同,可以加入 2012 年平均收入与时间固定效应的交互项,控制家庭的初始条件和随时间变动的不可观测趋势,以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基于上述条件,本文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新时代脱贫攻坚对居民收入极化的治理作用和机制,回归结果见表 9。其中,第(1)列考察了脱贫攻坚对居民收入增长的作用,第(2)列则考察了脱贫攻坚对居民阶层向上攀升的作用。第(1)列结果显示,政策变量与时间变量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战显著提高了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居民的收入。第(2)列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数,这意味着脱贫攻坚改善了居民收入流动性,畅通了向上流动通道。可见,脱贫攻坚既保障了贫困地区居民的收入增长,又缩小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改善了收入流



的差异是居民收入极化形成的最大诱因,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地方政府评价和人口特征差异对居民收入极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从居民收入极化扩大的主要因素来看,富有禀赋的群体其优势具有不断积累的特征,在缺乏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容易形成马太效应,同时城镇居民、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高于其他居民,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加剧了马太效应,成为收入极化扩大的主要因素。从居民收入极化固化的潜在因素上来看,中国目前社会流动性水平较充足,低收入群体的向上流动通道畅通,收入极化固化在中国并没有出现。但各收入阶层流动性存在差异,尤其是两端收入群体流动性较中间群体低值得关注,因此,防止两极分化必须构建起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从中国“消解收入极化”的机制上来看,一方面通过反事实分解法剥离了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对居民收入极化的治理效应,检验了分配制度体系对消解收入极化的基础性作用,发现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有效消解了市场收入的极化水平;另一方面以脱贫攻坚战为典型政策,使用全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名单,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政府的调控手段对居民收入极化的治理作用,发现脱贫攻坚战显著加快了贫困居民的收入增长,提高了低收入居民流动性,有效消解了收入极化。

## (二)政策含义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防止居民收入两极分化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

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的研究可能有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提高分配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合理性。防止居民收入出现两极分化,一方面要根除极化赖以滋生的土壤,因此要在宏观上不断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努力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另一方面在微观上引导居民形成更合理的收入结构,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经营收入,发挥转移性收入的调节作用,多种渠道优化分配结构和收入结构。

第二,着力消除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家庭在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不仅资源禀赋悬殊,在享有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就业环境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若不加以调节,这种差距在马太效应的影响下将成为居民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的重要成因。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将有助于防止两极分化,一方面要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现新型城镇化,推动城乡要素资源的有效流动和公平交换;另一方面要不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针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各地区禀赋条件和发展阶段,因时因势因地制宜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各区域协调互促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三,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要加快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为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发挥党和政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调节收入分配的优势,综合使用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等手段不断改善居民收入流动性,缩小居民收入极化水平,以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 七、结语

本文从居民收入极化的视角探研了中国的共同富裕道路,测算了中国居民收入极化的趋势,对居民收入极化的形成、扩大、固化以及消解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对于中国控制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对收入极化的测度指标还有进一步创新的空间,目前所用指标均有所侧重,因而需要采取多个指标对居民收入极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以保证结果稳健;二是对各机制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针对居民收入极化的马太效应、收入极化与收入流动性的动态关系等问题,本文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当前的学术界也少有涉及,未来可继续对此展开研究。

### 参考文献:

- [1] 李实. 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J]. 经济研究,2021(11):4-13.
- [2] 胡莹. 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的收入差距分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9):40-50.
- [3] ALESINA A,PEROTTI R.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vestment[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6(6):1203-1228.
- [4] KURER T,PALIER B. Shrinking and shouting: the political revolt of the declining middle in times of employment polarization[J]. Research & politics,2019(1):1-6.
- [5] WOLFSON M C. When inequalities diverg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2):353-358.
- [6] ESTEBAN J M,RAY D. On the measurement of polarization[J]. Econometrica,1994(4):819-851.
- [7] WANG J,CAMINADA K,GOUDSWAARD K, et al. Income polarization i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Europe wide,2004—2012[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18(3):797-816.
- [8] ANDERSON G,THOMAS J. Measuring multi-group polarization, segmentation and ambiguity: increasingly unequal yet similar constituent Canadian income distribution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9,145:1001-1032.
- [9] CLEMENTI F,DABALEN A L,MOLINI V, et al. When the centre can not hold: patterns of polarization in Nigeria[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017(4):608-632.
- [10] 洪兴建,董君. 多维极化的测度:新的方法及其应用[J]. 统计研究,2020(9):24-33.
- [11] 罗楚亮. 中国居民收入分布与财产分布的极化[J]. 统计研究,2018(11):82-92.
- [12] WANG J,CAMINADA K,WANG C. Measuring income polarization for twenty European countries:a Shapley growth-redistribution decomposition[J].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2017(6):477-499.
- [13] 汪晨,万广华,曹晖.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极化的趋势及其分解:1988-2007年[J]. 劳动经济研究,2015(5):45-68.
- [14] 万海远,陈基平. 收入分配极化的最新变动与成因[J]. 统计研究,2023(2):117-131.

- [15] 陈斌开,张鹏飞,杨汝岱. 政府教育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 管理世界,2010(1):36-43.
- [16] 周晔馨. 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吗? ——基于中国农户收入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12(7):83-95.
- [17] 李海舰,杜爽. 推进共同富裕若干问题探析[J]. 改革,2021(12):1-15.
- [18] FOSTER J E, WOLFSON M C. Polar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 Canada and the US[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10(2):247-273.
- [19] ESTEBAN J, GRADÍN C, RAY D. An extension of a measure of polarization,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of five OECD countries[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07(1):1-19.
- [20] VEGA M, URRUTIA A M. An alternative formulation of the Esteban-Gradín-Ray extended measure of polarization[J]. Journal of income distribution, 2006(3-4):42-54.
- [21] 洪兴建,李金昌. 两极分化测度方法述评与中国居民收入两极分化[J]. 经济研究,2007(11):139-153.
- [22] 李培林,朱迪. 努力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基于2006—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15(1):45-65,203.
- [23] 李敬,冉光和,万广华.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解释——基于劳动分工理论与 Shapley 值分解方法[J]. 经济研究,2007(5):42-54.
- [24] 周广肃,樊纲,申广军. 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2014(7):12-21,51,187.
- [25] 王修华,赵亚雄. 数字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 ——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经验比较[J]. 金融研究,2020(7):114-133.
- [26] 彭澎,周力. 中国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影响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6):23-41.
- [27] KRISTJÁNSSON A S. Income redistribution in Iceland: development and European comparisons[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ecurity, 2011(4):392-423.
- [28] 蔡萌,岳希明. 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市场还是政府政策?[J]. 财经研究,2016(4):4-14.
- [29] 徐舒,王韶,杨汝岱. 国家级贫困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J]. 经济研究,2020(4):134-149.

(责任编辑:王佳)